

## 对郭沫若思想“转向”的再解读

——从浪漫主义与革命文学的内在精神结构联系谈起

於 璐

**摘 要：**本文将以郭沫若为主，兼谈整个创造社的转向问题。本文认为，不能因为郭沫若看似抛弃了浪漫主义而将它简单地视为革命文学的对立面，实际上，革命文学与浪漫主义之间存在着深层的精神结构的关联。正是这些郭沫若自己也未必能够体察到的隐秘精神结构联系，使得一场思想剧变在当时转向中的浪漫主义者看来是一种近乎平滑的过渡。通过这种关联，浪漫主义在革命过程中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而在这种平滑下所隐含的矛盾和裂缝最终导致了后来革命文学的一些问题。

**关键词：**郭沫若 浪漫主义 革命文学 精神结构

作为“革命文学”较早的提出者和倡导者，郭沫若在这一文学创作理念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促使了创造社的整体转向，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影响深远。郭沫若为何从早期的浪漫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作为文学史中的关键问题，一直是学界所讨论的热点。在这一问题的探讨中，目前学界的代表性观点主要有：一、当时无产阶级政治运动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工人运动初见端倪，尤其是“五卅”运动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促成了郭沫若思想的“剧变”；<sup>①</sup>二、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面临着国内军阀割据、帝国主

<sup>①</sup> Clarence Moy, “Kuo Mo-jo and the Creation Society”, *Papers on China*, 1950, No.4, pp.131—139. 这篇发表在哈佛 *Papers on China* 第4期上的文章是欧美汉学较早研究郭沫若和创造社的学术成果，其中很多观点和材料被学界广泛接受。此文章表示，“五卅”运动使得马克思主

义势力干涉、资本主义的剥削性和压迫性特征开始显现等问题，强调推崇自我和关注内心精神世界的浪漫主义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三、人员的更迭及新思想的传入，使得原本的创造社宗旨发生了改变；<sup>①</sup>四、创造社内其他人员心理结构的变化对郭沫若的影响。然而我们看到，革命形势、内忧外患等对郭沫若思想变化的作用，是从注重强调外部环境影响的传统的社会学分析方法角度着手的。此外，学者还多注重从人员更迭、新思想传入以及成员心态的变迁，倚重于郭沫若自身对转向原因的回忆。这些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但仍存在着一些难以解释的方面。

文学史的论述多以“五卅”运动为促成郭沫若转向的重要原因和时间节点。然而，早在1923年《创造周报》创刊不久后，郭沫若便开始注意到了文学与革命的联系。1923年4月，郭沫若作诗《上海的清晨》，表示厌恶“富儿们”，愿与“男女工人们”相亲，相信“就在这静安寺路的马路中央，终会有剧烈的火山”。<sup>②</sup>此诗已经流露出郭沫若对无产阶级革命及工人运动的模糊认识。此后，郭沫若在为日本大阪《朝日新闻》所作的《我们的新文学运动》中，指出“我们的运动要在文学之中爆发出无产阶级的精神，精赤裸裸的人性”。<sup>③</sup>又于1923年5月作诗《朋友们枪聚在囚牢里》，表示要“到民间去”、“到兵间去”<sup>④</sup>，并在致宗白华的书信中认定“马克思与列宁终究是我辈

---

义对创造社的转向产生极大影响，那些意识到抛弃他们原来主张的必要性的成员，转向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关注。又如钱理群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指出：“创造社的文学活动以1925年‘五卅’为界，分为前后两期。随着革命形势的深入发展，后期创造社转向提倡‘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见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4页。

- ① 如张勇《前期创造社期刊与创造社“转向”研究》（《郭沫若学刊》，2009年第3期，第51—55页）从期刊角度指出人员的更迭是创造社“转向”的重要内部原因。
- ② 龚济民、方仁慈：《郭沫若年谱》，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10页。郭沫若：《上海的清晨》，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70页，第319—320页。
- ③ 郭沫若：《我们的新文学运动》，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5页。
- ④ 龚济民、方仁慈：《郭沫若年谱》，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14页。郭沫若：《朋

青年所当钦崇的杰士”<sup>①</sup>。这说明郭沫若在《创造周刊》早期便展现出了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的亲近。尽管此时郭沫若还并未清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及革命实质，但他已经意识到文学通向革命的可能出路。因此，“五卅”运动的影响不足以解释原本进行浪漫主义实践的郭沫若的转向。

在这一问题的讨论中，除了从社会分析法角度着手进行研究，创造社成员后来的回忆录所记载的心路历程成为学者进行研究的主要材料资源。但是这样的研究方法存在着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在郭沫若、王独清对当时的转变历程进行后来的回忆叙述时，已经不自觉地运用上了他们从马克思那里得到启发的社会分析法，将人作为一种社会性成分进行分析，将强调的重点放在当时社会环境因素致其转变上，这一点易对学术研究产生误导。二是回忆录存在着后期修饰的成分，即便不是刻意掩盖或矫饰，作家心境经历和思想的变迁也会对以前发生的事情带来新的解释，从而间接掩饰了当时的历史真相。因此，当我们在对待关于郭沫若思想转向方面的回忆时，应当谨慎对待，而不是直接拿来作为既成事实。事实上，要考虑郭沫若在转向过程中的心路历程，更为可靠和直接的材料是他当时的书信、日记、作品和论争文章。文学负载着思想在时代和作家身上留下的痕迹，折射出当时当事人的心灵状态和思想状态。本文试图在史实、作品与回忆录的多重互证中，寻找出郭沫若的思想转向这一现象背后的深层思想实质。

郑伯奇在谈到郭沫若思想转变的内在原因时，关注到郭沫若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的主动接受态度。<sup>②</sup>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实际上郭沫若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的认识并不十分明确，但为何能够很

友们枪聚在囚牢里》，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 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70页，第323—324页。

① 郭沫若：《论中德文化书——致宗白华兄》，《郭沫若全集》（文学编 第十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152页。

② 郑伯奇：《创造社三题》，选自郑伯奇《忆创造社及其他》，郑延顺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年，第92—93页。

容易就接纳了这一看似与自己原来所坚持的浪漫主义思想所对立的理念。如果我们谨慎地对待回忆录，将重点从他自己所强调的外部环境因素转到偶尔透露出的内部心理层面上来，我们就会发现郭沫若、王独清等人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多次描述自己转变过程中的心态时，用了“直觉的作用”、“不知道几时”、“自然发生性”这样的描述<sup>①</sup>。那么，问题是，是什么样的精神机制使得这种思想上的剧变似乎呈现出一种自然而然的平滑过渡？

我们在本文中想要强调的是，我们不能因为郭沫若抛弃了浪漫主义而将它简单地视为革命文学的对立面，实际上，革命文学与浪漫主义之间存在着深层的精神结构的关联。正是这种隐秘精神结构的联系，使得一场思想剧变在当时转向中的浪漫主义者看来是一种近乎平滑的过渡。即便是郭沫若自己也未能明确体察到。通过这种关联，浪漫主义在革命过程中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而在这种平滑下所隐含的矛盾和裂缝最终导致了后来革命文学的一些问题。

## 一、中国早期浪漫主义的反建制特征和功利主义倾向

郭沫若在转向期的书信、日记、回忆录及后来其他创造社成员的回忆中，普遍表达出一种“矛盾的苦闷”。王独清回忆，“五卅”前夕，在上海的“几个创造社底中坚便觉到了矛盾的苦闷。……在上海的郭沫若与成仿吾便因为这种矛盾的苦闷自动地把第一时期的运动告了结束”<sup>②</sup>。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也这样表述过渡期自己的思想：“在

① 郭沫若表示：“当时的人称为是创造社的‘剧变’，其实创造社大部分的份子，并未转变过来，即是郭沫若的转换，也是自然发生性的，并没有十分清晰的目标意识。”详见郭沫若：《创造社的自我批判》，黄人影编：《创造社论》，上海：上海光华书局，1932年，第75页。郭又说：“从前在意识边沿上的马克思、列宁不知道几时把斯宾诺莎、歌德挤掉了，占据了意识的中心。”详见郭沫若：《创造十年》，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184页。

② 王独清：《我和她的始终与她底总帐》，黄人影编：《创造社论》，上海：上海光华书局，1932年，第10页。

我的思想上也正感受着一种进退维谷的苦闷。”<sup>①</sup>这种苦闷实际上来自于对中国早期浪漫主义局限性的体察和感受，感到浪漫主义与当下人生理想之间矛盾。他认识到原本的浪漫主义主张无法再继续下去，这说明他认识到了浪漫主义的局限性所在，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对中国早期浪漫主义自身局限的认知。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便是，创造社的浪漫主义存在着什么样的局限性，使得曾经积极提倡并为之进行多次论战的郭沫若主动抛弃了它而奔向马克思主义。

夏志清深刻地指出了早期浪漫主义缺乏超越性的思考：“在这个文学运动中，没有像山姆·柯尔立基那样的人来指出想象力之重要；没有华茨华斯来向我们证实无所不在的神的存在；没有威廉·布雷克去探测人类心灵为善与为恶的无比力量。早期中国现代文学的浪漫作品是非常现世的，很少有在心理上或在哲理上对人生有深度的探讨。”<sup>②</sup>夏志清认识到了中国浪漫主义的现世性和其局限，但是要回答中国早期的浪漫主义者为什么缺乏形而上的思考，我们就必须进一步看到，中国早期的浪漫主义，呈现出一种反建制的自由倾向。郭沫若在以“创造”来命名这个社团和期刊时，已经表达出了对这一理念的理解：一切都是自我的自由艺术创造的结果。创造社并不标榜任何主义或宗旨<sup>③</sup>，也是反建制的一种体现。浪漫主义的自由并不是与外部世界对立或者逃避，而是通过艺术创造的形式在自我内部获得，来实现对人的有限性的超越。但是，当他们的浪漫自我与现实接触时，不可避免地会与现实发生冲撞，于是便现实地转化为冲破“此在”的桎梏，从向内部寻求自由转向更大范围的外部寻找自由。

① 郭沫若：《创造十年》，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184页。

②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页。

③ 创造社从成立伊始就并没有什么明确的较为统一的思想主张，这一点郭沫若在创造社成立初期表明宗旨时说：“我们这个小社，并没有固定的组织，我们没有章程，没有机关，也没有划一的主义。我们是几个朋友随意合拢来的。我们的主义，我们的思想并不相同，也并不比强求相同。我们所同的，只是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的活动罢了。”详见郭沫若：《编辑余谈》，《创造》季刊第二期，1923年。

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便可以理解郭沫若在早期和转向后观点的一致性与差异性。早期创造社成员尤其是郭沫若的创作，社会性和现实性并不强。如郭沫若的《天狗》《站在地球边放号》等便是表达出了打破一切外界的束缚、获得绝对的自由和至高无上的自我的思想，表达了一种“对无限的向往（Sehnsucht）……对蓝色花朵的追寻。对蓝色花朵的追寻，是自我吸收无限的尝试，是自我与无限合一的尝试，也是自我融入无限的尝试”<sup>①</sup>。据郭沫若自己说，在写《天狗》时并没有考虑到什么社会性目的，只是凭借内心的激情进行创作。我们此前提到，浪漫主义参与进现实的方式，是将现实浪漫化为一种美学想象，从而获得形而上学自由。但是，中国早期的浪漫主义者并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当郭沫若面向现实时，感到追求自由的浪漫自我处处受到压制。1924年，在与成仿吾的通信中，郭沫若表示，青年人共通的苦闷在于自我的实现，而之所以没有实现，是因为“我们所共通的一种烦闷，一种倦怠——我怕是我们的青年全体所共通的一种烦闷，一种倦怠——是我们没有这样的幸运以求自我的完成”，“我们失却了路标，我们陷于无为，所以我们烦闷，我们倦怠，我们漂流，我们甚至常想自杀”，我们不能够找到自我的意义，是因为“我们内部的要求与外部的条件不能一致”，是社会阻碍了自我的实现。而他对思想解放后文艺的看法是：“在社会主义实现后的那时，文艺上的伟大的天才们得遂其自由完全的发展，那时的社会一切阶级都没有，一切生活的烦苦除去自然的生理的之外都没有了，那时人才能还其本来，文艺才能以纯真的性为其对象，这才有真正的纯文艺出现。”<sup>②</sup>让人还其本来，让自我得到自由完全的发展，这是郭沫若对社会革命的期待。可以看出这和郭沫若的“创造”理念是一脉相承的——自我得到自由、无限的扩张。创造社成员迫切需要寻找与世界的连接点，来实现更大范围内的自由。这是他们进行改变的初衷。马克思主义预

① 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106页。

② 郭沫若：《致成仿吾书》，《中国新文学大系》（第6册），第233—234页，第241—242页。

设了一个自由、平等的世界的理想，这对于当时处在精神焦虑和苦闷中的创造社成员具有极大吸引力。

另一个方面，从更广的层面讲，中国早期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着形而上学的精神危机。“五四”激烈的反传统态度颠覆了知识分子原有的精神结构。在形而上学层面，“五四”有破而无立。“五四”所着力建树的是在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等伦理层面，而并没有建构一套完整的精神哲学来告诉人们“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也就是对于超越此在的终极追求的解释，对于世界的解释。在西方，当宗教权威被怀疑和动摇以后，理性和信仰并存为现代人的两大精神支柱。然而，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理性的概念还处在刚刚萌芽的阶段，并不足以支撑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五四”以后，各种主义纷至沓来，一方面是国人对国外资源的积极吸收，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深层的精神焦虑，他们迫切需要一种信仰，一种对世界的解释方式，一种人生意义的阐释。而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早期创造社所追求的浪漫主义缺乏形而上学的向度，但这并不是说创造社成员完全不了解浪漫主义的形而上学维度，作为构成浪漫主义的基本美学原则，如郭沫若对于“创造”这一理念的理解、对泛神论的接受等可以看出是对浪漫主义的诗化哲学是有所了解的。冯乃超后来分析浪漫主义摆脱痛苦的途径：“他们苦痛的解脱，他们不从社会制度的变革里面希望它，却在心灵的解放、精神的自由上找寻。”<sup>①</sup>但冯乃超接着分析当面对工业文明给人带来的压制时，浪漫主义将不能仅在内部升华苦痛。学者俞兆林指出这篇文章与此前郭沫若的《论中德文化书》有着相似的思想，即在工业文明带来的桎梏中，浪漫主义选择转向内心而非外部，然而这在当今中国，是不能行得通的。尽管有些创造社成员对浪漫主义的形而上学层面有浅显的了解，但要强调的是这仍不足以为他们提供超越性的精神庇护，不能为他们解释人生的意义何在。因此，他们

<sup>①</sup> 冯乃超：《冷静的头脑——评梁实秋的〈文学与革命〉》，《创造社资料》（上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15页。

在倡导浪漫主义的短短两年之后便又陷入了精神危机之中。

综上所述，创造社所接受的浪漫主义具有明显的反建制和自由主义特征，但是却缺乏对浪漫主义超越性层面的深刻理解和接受。因此，在中国语境下，这一浪漫主义所呈现出的局限性，导致这些早期浪漫主义者面临精神焦虑之困，这是他们趋向转向的重要内在原因。

## 二、浪漫主义与革命文学的内在精神层面的关联

但是，早期创造社的浪漫主义在中国语境下所显示出的局限性，还不足以说明郭沫若为什么要转向马克思主义。创造社由浪漫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过程本身是一场思想剧变，但这一过程却显得平滑而少思想上的挣扎和冲突（我们看到，当郭沫若在转向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无论是当时还是事后回忆，都没有明显的因为思想转换而带来的内心矛盾、焦虑和挣扎）。很多学者在解释这一点时着重于郭沫若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感，但却并没有说清楚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认同感。<sup>①</sup> 本文要指出的是，郭沫若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来作为精神向导和毕生追求，而且这种激烈的思想转换在他看来却是自然而然的，是因为浪漫主义与革命有着隐秘的精神结构关联，马克思主义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他所感受到的浪漫主义的局限性，缓解了他的精神焦虑。

其中最为明显的精神性关联便是反抗性，浪漫主义和革命都具备反现有制度的特征。朱自清曾指出了郭沫若诗歌的两个显著特征：一是泛神论思想，二是 20 世纪的反抗精神。<sup>②</sup> 这一看法为当时和现在的

① 如张旭春表示：“创造社的政治转向有多种原因，其中最主要的还是两个：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自觉认同和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张旭春：《政治的审美化与审美的政治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38页。但他并没有进一步说明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自觉”。

② 朱自清：《〈诗集〉序》，选自朱自清选编，第八集《诗集》，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5页。

大多数学者所接受<sup>①</sup>，认为郭沫若早期的诗歌尤其是《女神》表达出了除旧布新、推翻旧社会旧制度的激烈反抗情绪。事实上，这一被学界所普遍接受的观点存在着问题。我们从郭沫若本人的表述中可以看出，他在写《女神》的时候并没有太多考虑到社会需求。与其说郭沫若的诗歌表达了“五四”时期的时代精神，不如说“五四”时期所开创的自由风气给了郭沫若的浪漫主义以生长的土壤。郭沫若在1936年的回忆性散文《我的作诗的经过》中表示：“在‘五四’之后我却一时性地爆发了起来，真是象火山一样爆发了起来。这在别人看来虽嫌其暴，但在我深有意义的，我在希望着那样的爆发再来。”<sup>②</sup>“五四”激烈的反传统精神刺激了郭沫若的浪漫自我，而他写的诗歌也恰好契合了“五四”的时代精神。在这里我们还要注意的一点是，郭沫若的诗歌之所以被这样解读还存在着读者接受的问题。在接受美学看来，文本的解读是作者、读者和文本多重互动的结果，“分析审美反映，必须把它放到本文、读者及其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中才能进行”<sup>③</sup>。当时的读者发现了郭沫若诗歌中的浪漫反抗情绪和“五四”精神的相通处，但并没有细细去考察两者之间的内在差异，便将其诗歌视为是时代呼声。所以，郭沫若诗歌的社会形象很大程度上是读者所塑造的，但是，后来读者的解读也影响到了作者的写作。郭沫若发现了这样的解读更加有利于他今后的文学道路，便在后来的创作中积极回应社会

① 比如闻一多在《女神之时代精神》（《创造周报》第四号，1923年6月3日，第3—10页）中表示：“若讲新诗，郭沫若君底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有人将文艺作品是时代底产儿。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二十世纪是个反抗的世纪。……女神中这种精神更了如指掌。”钱理群、秦家伦在《新中国预言诗人的歌唱——略论郭沫若的〈女神〉的思想特色与独特贡献》（1978年12月《贵州文艺》第6期，第70—74页）一文中表示：“这些诗作，深刻地反映了‘五四’时期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这就是《女神》反抗精神的特色。”

② 郭沫若：《我的作诗的经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220页。

③ 沃尔夫冈·伊瑟尔：《阅读活动：审美反应理论》，金元浦、周宁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2页。

诉求，也改变了对此前创作动机的措辞。他在《艺术家的觉悟》中表示：“至于说到我的思想上来，凡为读过我从前的作品的人，只要是真正和我的作品的内容接触过，我想总不会发现除我从前的思想和现在的思想有什么绝对的矛盾的。我素来是站在民众方面说话的人，不过我从前的思想不大鲜明，现在要鲜明了些，从前的思想不打统一，现在更统一了些罢了。”<sup>①</sup> 我们认识清楚郭沫若诗歌和“五四”时代精神之间的相通和差异之后，才能够进一步讨论浪漫主义与革命之间的关系。

雅克·巴尊在其具有开创性的论著《古典的，浪漫的，现代的》中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关联：“马克思主义的废除主义，建立在浪漫主义的前提上，合理地导致摧毁与过去连接的任何制度的内容。”<sup>②</sup> 浪漫主义反抗的是自我层面的既成桎梏，革命反抗的是现有制度，尽管浪漫主义是美学意义上的，革命是实际效果上的，但两者在反建制这点上达成了某种共识。成仿吾在其代表性论文《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表示：“是这种创作方面的努力就了我们全文学革命的运动。创造社以反抗的精神，真挚的热诚，批判的态度与不断的努力，一方面给与觉悟的青年以鼓励与安慰，他方面不息地努力完成我们的语体。”<sup>③</sup> 他接着强调，创造社的这种反抗精神是颇具革命性的，要将此运用到革命的推动中，来作为知识阶层的榜样。反抗性=革命性，这是创造社对革命的简单理解。值得注意的是，郭沫若在《我们的文学新运动》与此前的作品《天狗》有着极为相似的精神结构，也恰恰显示出其转向时期的思想状态，而这一点并没有为学界所重视。在这篇最初发表在日本大阪《朝日新闻》上的文章要求文学家所具有的反抗性能量与《天狗》中所表现的是同一模式。《天狗》中“吞月”“吞

① 郭沫若：《艺术家的觉悟》。

② 雅克·巴尊：《古典的，浪漫的，现代的》，侯蓓译，何念校，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32页。

③ 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创造社资料》（上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67页。

日”“吞宇宙的一切”<sup>①</sup>，也就是将万物都纳入自我的范畴，因而自我获得绝对的能量，摧毁一切阻碍自我的东西，只剩下绝对的精神层面的自由和至高无上的自我。这种绝对自我极具反建制性，因为任何固定的东西都是自我的他者，是对绝对自我的权威性的削弱。而革命在同样具有反抗性这一连接点的同时，为这种功利主义提供了实践性的出路——对外界社会的批判。郭沫若的这篇《我们的文学新运动》便显示出了转向时期的相通与差异。读者可能会发现这篇文章的奇特逻辑，前面说我们要像黄河、长江一样吸收宇宙的能量，“融化一切外来之物于自我之中，使之自我之血液，滚滚而流，流出全部之自我”，后面得出的结论却是这样的自我就能够“反抗资本主义的毒龙”、“反抗不以个性为根底的既成道德”、“反抗否定人生的一切既成宗教”、“反抗藩篱人世的一切不合理的畛域”。前提和结论之间看似不相干但又似乎实现了顺理成章的过渡，关键就在于中间的连接是“有岩石的抵抗则破坏！有不合理的堤防则破坏！……我们的事业，在目下浑沌之中，要先从破坏做起。我们的精神为‘反抗’的烈火燃得透明”<sup>②</sup>。反抗性将浪漫自我和革命联系在了一起，反抗“既成”的东西，既是浪漫主义在美学意义上的要求，也是革命在实际社会效果上的反抗性。但当时的创造社成员并没有谨慎思考两者之间的差异，他们迫切地需要在他们原有的精神结构基础上寻找一条出路，来缓解其精神焦虑，而同样具有实际意义的反抗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减少了转向过程中接受新思想的精神阻碍，因此更容易为创造社成员所接受。

更深层的精神联系在于，马克思主义弥补了浪漫主义不能给创造社成员带来的形而上学思考，缓解了他们对于此在和超越的精神焦虑。此前我们提到，创造社成员虽然对浪漫主义的接受是浅薄的，但当

① 郭沫若：《天狗》，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 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70页，第54—55页。

② 郭沫若：《我们的文学新运动》，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 第十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3—5页。

们接触到浪漫主义时，毫无疑问对浪漫主义的基本美学原则是有所理解的。他们最初选择浪漫主义来作为文学方向，一方面是对其激情和反抗性的着迷，另一方面，也是对浪漫主义所蕴含的超越性诉求的渴望。但相对于浪漫主义强调在个人领域内实现精神的自由和超越而言，马克思主义在吸引创造社成员方面则更具优越性。首先，革命同样是一种由有限向无限的超越，将渺小的有限的个人融入到历史的永恒潮流中去，使对于个人现世生活的超越。其次，马克思主义更具实践性和现实性，能够满足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救世情怀。它以科学的方式提供了一套对人的存在和意义的解释，而我们看到，20世纪初期正是理性和科学在中国广为接受和传播的年代，这对处在精神危机中的知识分子是有着极大吸引力的。郭沫若在日本期间给成仿吾的信中表示：“现在有一个维系着生命的梦想……译读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sup>①</sup>对于郭沫若来说，革命不仅意味着一种社会行动，而且是人生意义的寄托。在回国前郭沫若致信成仿吾：“我现在成了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了！马克思主义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唯一的宝筏。”<sup>②</sup>值得注意的是，郭沫若在这里用了“信徒”。同样做出这种表达的还有深受创造社影响的白薇的戏剧《革命神受难》，这都暗示了马克思主义的作用是为早期浪漫主义者带来精神慰藉。

此外，浪漫激情和革命情绪之间的内在关联也是郭沫若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郭沫若主动将文学的情感与革命感情联系在一起：“我们知道文学的本质是始于感情终于感情的。文学家把自己的感情表现出来，而他的目的——不管是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总是在读者心中引起同样的情感作用的。那吗作者的感情愈强烈愈普遍，而作品的效果也就愈强烈愈普遍。……革命时代的希求革命的感情是

① 郭沫若：《通信一则》，《创造周报》五十二号，1924年5月19日，第15—16页。

② 郭沫若：《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8页。

最强烈最普遍的一种团体感情，由这种感情表现而为革命。”<sup>①</sup>事实上，郭沫若等人将浪漫情绪运用到革命宣传中去时，所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煽动革命情绪。如施密特所说，浪漫主义参与政治的方式是将政治浪漫化。浪漫主义者并不对政治进行道德思考和判断，“浪漫主义行为理论坚持激起激情的原则。……一个行为的伦理特征唯一基于它是否表达或激发了某种情感状态”。因此，“政治浪漫主义最喜爱的活动是批评、讨论或对话，这是浪漫者诗化政治的工具。”<sup>②</sup>我们看到，郭沫若、成仿吾等人参与革命的积极方式便是引发了关于革命文学的争论。无论他们表现得多么积极想参与现实，他们真正关心的是在这种争论中激情得到了满足。李初梨在反思早期“革命文学”时表示：“革命文学！革命文学！声浪尽管大，议论尽管多，然而究竟什么是革命文学？它的内容如何？形式又如何？它的必然性在哪里？我们要如何地去建设它？除了一些空疏的抽象论而外，我们还没有看过一个明了的解答。”<sup>③</sup>李初梨的批评道出了革命的浪漫化的问题所在，争论不能真正给革命带来实际的建设，只有一些空洞的口号和呐喊。鲁迅批评在革命中成仿吾实际起到的负面效果：“再则他们，尤其是成仿吾先生，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这种令人‘知道点革命的厉害’，只图自己说得畅快的态度，也还是中了才子+流氓的毒。”<sup>④</sup>因此，我们必须看到，创造社成员在激情这个层面上与革命取得了精神联系，但这一联系具有双刃剑的作用，它一方面能够煽动革命情绪，另一方面，使得革命及革命文学愈发向激进的方向发展。

① 郭沫若：《革命与文学》，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 第十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38页。

② Carl Schmitt, *Political Romanticis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86, xxvi—xxvii.

③ 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创造社资料》（上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1页。

④ 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选自黄人影编《创造社论》，上海：上海光华书局，1932年，第88页。

综上所述，在反建制性、超越性追求和激情等这些主要方面，浪漫主义与革命文学具有着精神结构的关联，这使得郭沫若的思想“剧变”能够在短期内实现看似平滑的过渡。

### 三、结语

在对郭沫若思想转向原因的考察中可以看到，前期提倡的浪漫主义和转向后的革命文学之间存在着内在精神结构的关联。从这一角度来看，不仅可以解释郭沫若思想转向的内部根本原因，而且可以为30年代的革命罗曼蒂克文学以及五六十年代革命浪漫主义的兴起与发展提供新的解读。正是因为这种潜在的联系，使得浪漫主义者参与进革命时不自觉地将革命浪漫化，所产生的潜在问题值得思考。

要澄清的一点是，革命对于浪漫主义者来说只是一种美学想象。用施密特的理论来说，是一种美学偶因，他提出要从主体方面而非客体方面来理解浪漫主义，“浪漫主义可以被理解为是主观化的偶因论，世界仅仅是个体想象自由游戏的偶因”<sup>①</sup>。浪漫主义者之所以迷恋革命，并非对资本主义的压迫感同身受或者对真实的革命斗争感兴趣，比如郭沫若虽然实际参加了北伐，但是在郭沫若的《北伐途中》和其他一些回忆北伐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时间，郭沫若只是负责政治宣传工作，对实际的革命决策、目的、路线方针等并不清楚，即便是在武昌时亲临战场，郭沫若不仅没有实际参战，而且重点着墨的还是实际战争中自身的有趣体验（如方便时正好炸弹落在旁边却没爆炸）。此外，他们对于资产阶级的憎恨和对无产阶级的同情很大程度上只是美学想象的产物。胡适在《我们走那条路？》表示：“我们要打倒五个大仇敌。……这五大仇敌之中，资本主义不在内，因为我们还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也不在内，因为我们至多有几个

<sup>①</sup> Carl Schmitt, *Political Romanticis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86, p. 124.

小富人，哪有什么资产阶级？”<sup>①</sup>在美国学习和生活过的胡适道出了这个关键性问题：中国当时并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或资本家。而马克思所道出的资本主义的弊端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存在的。20世纪初期的中国所面临所谓剥削工人阶级、贫富差距分化等问题，只是资本原始积累阶段所体现出的一些现象，而且只存在于上海等极少数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即便是郭沫若前期很多写资本主义罪恶的作品或评论文章，写于友人或自己陷入经济困境之时，也难以说明他对于社会现状的真正关切。如在创作《励失业的友人》当日（1923年5月27日），连续创作《朋友们枪聚在囚牢里》、《歌笑在富儿们的园里》等多篇诗作来表达要到工农兵群众中去，进行反抗斗争，抛弃以前的泛神论思想的态度。又如在因缴不起房租、全家被房主逐出的当月，写下《盲肠炎与资本主义》论述“资本家是社会的盲肠”，“社会的健康状态，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之下才能显现”（《洪水》周刊一期，1924年8月20日）。但是，郭沫若的贫困和友人的失业却并不是资本家剥削的结果，而是源于自身的人生选择（回国后，郭沫若拒绝了北京大学的教职和医生的聘请，专心文学事业）<sup>②</sup>。当他陷入经济的拮据状况时，对提倡消除贫富差距的马克思主义极易产生共鸣，进而同情一切的想象中同样拮据的无产者，对资本主义充满憎恨。这一点梁实秋和夏志清都有深刻的认识。梁实秋在指出浪漫主义者情感上的泛滥时表示：“情感在量上不加节制，在作者的人生观上必定附着产出‘人道主义’的色彩。人道主义的出发点是‘同情心’，更确切些应是‘普遍的同情心’。这无限制的同情，在一切的浪漫作品都常表现出来，在我们的新文学里亦极为显著。……吾人试细按普遍的同情，其起源固由于‘自爱’，‘自怜’之扩大，但其根本思想乃是建筑于一个极端的假设，这个假设就是‘人是平等的’。平等观念的由来，不是理性的，是情感的。重情态的浪漫主义者，因情感的

① 胡适：《我们走那条路？》，《新月》第二卷第十号，1929年12月10日，第4页。

② 龚济民、方仁慈：《郭沫若年谱》，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8页。

驱使，乃不能不流为人道主义者。”<sup>①</sup>夏志清同意梁实秋的观点，认为：“由于这种浪漫主义所探索的问题，没有深入人类心灵的隐蔽处，没有超越现世的经验，因此，我们只能把它看作一种人道主义——一种既关怀社会疾苦同时又不忘自怜自叹。自然界的一切，对我们这种浪漫主义者说来，只不过是一种陶冶性情的工具而已。他们关心的，倒是社会上贫富悬殊的现象，并希望能够寻求到一个公平的分配方法。”<sup>②</sup>梁实秋和夏志清都指出了两点：一、早期中国浪漫主义者的人道主义色彩；二、自怜自叹。但是，梁实秋谈到人道主义产生的原因是情感的泛滥，他没有进一步认识到这种普遍性的同情其实是浪漫主义的美学想象，在想象中他们的情感表达得到了满足。这一问题同样存在于夏志清的理解中。夏志清指出自然界并非浪漫主义者关切的对象，他们关心的是社会上贫富悬殊的现象。事实上，这些浪漫主义者虽然写过很多相关的文章和参与过论争，但他们并非真正关心，很少有具体底层生活的描写，也不去积极提出解决方案。他们只是在这种论争中找到美学想象的自由，施密特表示浪漫主义者在政治中的最主要行动便是争论。他们关心的是争论本身对他们的激情的满足，而不是争论的具体内容。梁实秋还说到关键性的一点便是，这种普遍的同情心的根底是自怜和自爱。浪漫主义者从自身出发，去推及其他人的感受。实际上他们并不关心其他人的实际感受是什么，他们关心的只是想象中其他人的感受。从这个意义上说，创造社的作品和论争中所谈到的资产阶级和终将灭亡的资本主义是一种想象中的产物。而在这种想象中，他们的激情得到了释放和升华。这是浪漫主义者的美学原则决定的，即只关注自我本身。因此，浪漫主义者转向革命时，从本意来说是为了从对个人内部世界的关注转向对外部世界的关注，但实际上，他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强大的浪漫主义精神结构使得他们将革命变

① 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续），《晨报副刊》，第1370号，1926年3月27日，第61—62页。

②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4页。

为一种美学想象，最终仍是为了满足自我内心的需求。

然而，我们要强调的是，这种精神结构的关联使得浪漫主义者将革命浪漫化的同时，也隐藏了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从浪漫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在这场思想剧变中，精神结构上的关联使得转向的过程少了一些阻碍，但是两种不同思想的转变之间毕竟留下了裂缝，而这种关联在裂缝中逐渐显示出其潜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对自我的推崇和集体主义对个体价值的否定和融化之间的矛盾，也是反抗与服从之间的矛盾。浪漫主义者的根本美学原则便是对绝对自我的推崇，强调个人的价值，反对任何对自我的束缚与制约，反对任何凌驾于自我之上的事物，而马克思主义强调个人是集体中的个人，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一切，强调个人对集体的服从甚至为了集体利益而牺牲个体价值。这一点，我们从白薇、蒋光慈德小说和郭小川的诗歌中可以观察到。在这样的矛盾双向互动中，浪漫主义最终抛弃了其基本原则——自我的自由，而与革命达成了共谋。

最后，需要谨慎思考的是，“革命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早期创造社成员中的浪漫主义者尤其是郭沫若发起和大力倡导起来的，革命由此成为文学的主题之一，而浪漫主义与革命文学也结下不解之缘。浪漫主义在文学层面以热情和理想主义鼓动起革命情绪，对革命产生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使得在这种狂热中，忽视了对革命本身的谨慎反思。在这场革命与文学的双向互动中，我们应该从更广的社会、历史、文化层面的多维度视野中充分重视到浪漫主义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以及这对整个中国文学和社会历史所产生的影响，而不仅仅是将浪漫主义看作是一种文学创作方法。